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评介

慈志刚*

国内关于中东民族主义研究，以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的著述影响最为深远，作为彭树智教授的学生之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韩志斌教授亦在中东民族主义问题研究上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其新著《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于2011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通过民族主义视角审视伊拉克复兴党的理论与实践，进而揭示出伊拉克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本质内容。该书超越了传统上关于中东政治发展史研究的固定轨迹，是一部民族主义个案分析的力作。这里笔者仅就阅读之心得与读者分享。

关于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理论

民族主义是中东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对20世纪中东历史发展之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中东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是最为重要的考量依据。《研究》一书，试图突破以往研究之窠臼。作者通过近10年的文献收集和整理，获自得之见解，在多个层面上突破了以往的研究范式，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对于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理论，作者在第一章进行了总体的概括，并在其后各章节中通过复兴党的实践活动介绍了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的动态演变轨迹。作者认为：第一，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与传统上西方和

* 本文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教授。

“东方”的民族主义类型不同，当然也不是复兴党民族主义者所坚持的完全“内生”类型，它是“西方文明与传统伊斯兰文明互动交往的产物与后果”。第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它“以复兴党在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实践为载体，以泛阿拉伯主义与伊斯兰教为纽带，以思想、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交融为内容，是一种多元交织的、开放的文化体系”。第三，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建构方式在于“对抗”与“再创造”，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殖民主义以及其后的地区秩序进行抗争，其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增强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性，进而从深层次挖掘并整合资源；同时，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复兴”和“再创造”民族文化成为必要的任务，在特定对抗环境下，对民族传统的坚持就是对外部压力的反抗。特别是在历史认同问题上，萨达姆下令重新编写伊拉克历史，为复兴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寻找理论依据。第四，民族主义遵循一种独特的“模仿——反抗”模式，它通过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批判吸收，从中获取可以利用的现代性成分，并且以此来改造和复兴传统文化，最终达到反抗和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目的。因此，复兴党民族主义带有其深层次矛盾：它对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既纷繁又混乱，这是其难以逾越的发展困境。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指导了伊拉克一个相当长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影响了它的治理模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学界对伊拉克有关问题的研究很少涉猎这一极具价值的命题，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萨达姆复兴党政权的成败时，却没有从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本身所潜在的深层次意含来分析其兴衰所折射出的结构性问题”。《研究》一书就是通过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来回答相应的一系列历史和现实问题。

关于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实践

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历史学研究也发生了民族主义转向，它们通过重新界定文化疆界的方法

式重塑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这成为20世纪穆斯林史学的主导趋势。^①这样，关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民族和民族国家构建等理论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热点研究话题，而影响民族国家现实走向的民族主义实践问题则长期得不到重视。实际上，忽视对民族主义实践层面的研究很容易导致对民族主义理论问题研究简单化，特别是在对诸如“本质”和“价值”等根本问题的分析上，多借助于西方理论工具和分析模式对中东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再解释”，从而导致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学者们多根据民族主义组织或个人的著述、文献和纲领等对民族主义进行类型分析和判断，实际上这种分析和判断的依据是不完全的。在实践层面上，任何致力于创建民族国家的行为，不论其行为者是否倡导和宣扬民族主义理论，都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

诚如作者所言，伊拉克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存在着“版图错位”的现象，这造成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境。其一是教派矛盾。伊拉克什叶派约占人口的60%，而逊尼派约占20%，二者在权力分配等方面存在着利益冲突。其二是民族矛盾。约占伊拉克人口15%的库尔德人始终是伊拉克政治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复兴党民族主义与库尔德人的民族诉求之间整合的失败造成了二者之间政治的悲剧。其三是部落矛盾。在中东地区，以血缘谱系为认同纽带的家族和部落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萨达姆家族以及效忠于萨达姆的部落在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也构成了萨达姆政权结构中的核心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后，伊拉克部落主义的勃兴表明复兴党向“原始”和“传统”的回归，其保守性和排他性增强。其四是地区矛盾。复兴党的三大目标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阿拉伯民族统一在复兴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伊拉克复兴党也作出几次地区联合的实践尝试。《研究》一书通过专题的表述方式，勾勒出伊拉克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脉络，即它从“复兴”式的防御型民族主义转变为“对抗”式的进攻型民族主义（两伊战争为例），至海湾战争时期演变为穷兵黩武的侵略型民族主义。当民族认同感需要暴力来维系，它彰显出来的只是国家利益至上，这也表明泛民族主义的式微。

^① 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伊拉克复兴党执政以后,其民族主义理论得以贯彻执行,而上述诸矛盾使实践中的民族主义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与理论层面的民族主义相比较,实践层面的民族主义表现的更为丰富多彩。《研究》一书对伊拉克复兴党的民族主义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对其建构伊拉克民族国家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第一,关于魅力型统治的建构。复兴党建构民族国家困难重重:“伊拉克教派、民族多样化,缺乏一个利益和观念的‘共同体’,一个合法性来源”,总之,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缺乏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在这一前提下,为了使民族主义这一虚构的“想象共同体”走向现实,就必须建立群众广泛接受的权威,在伊拉克,权威的建立只能从“象征”中寻找答案,萨达姆个人魅力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执行者,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作者认为魅力是一种巨大的革命力量。但魅力型统治也有其内在的矛盾,那就是共识容易达成,而分歧难以弥合,这也是长期困扰伊拉克政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第二,关于经济与社会治理。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使其民族主义理论具体化,再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果强化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伊拉克国有化,石油收入的增加,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范围的扩大,妇女解放与扫盲运动为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国家治理适时提供了温床”。因此,复兴党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既推动了伊拉克的现代化变革,也有利于民族主义政府的合法性建设。第三,关于民族主义外交。民族主义通过确认“我者”与“他者”边界的方式实现内外分际,并通过防御——对抗——进攻的对外行为模式转换寻求民族的生存、荣耀和最大利益。特别是在政治体系遭受政治转型的冲击时,“对外战争成为民族主义者规避国内危机,寻求民众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常用手段。”第四,关于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作者所言,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是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历史文化为纽带,以改造社会生活为目标,对伊拉克进行系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和渗透。这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复兴党在开发历史资源上做了较多努力,如宣传伊拉克古典文化艺术,发掘和保护历史文物,重新引起传统节日,追求古代艺术和重写伊拉克历史等。总之,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在实践层面表现出二元特征,它有适应历史变革的合理性,也有跳跃性和突变式的非理性倾向,“复兴党民族主义作为指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可以与不同奋斗目标的行为体相结合,体现出不同的内容,”这就是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之所在。

关于文明交往理论关照下的民族主义研究

文明交往理论是彭树智教授提出的，从全球文明和谐视角关注人类文明生存和发展的史学理论，作为文明交往最基本单位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是文明交往理论研究的重点。《研究》一书从方法论来讲，它“以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史观为指导，注重对诸多具体的史例个案作具体分析，从而得出具体的理论，是科学研究的途径。”^①从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渊源来看，它是阿拉伯地方传统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它反映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当代文明交往条件下，由衰落走向复兴的自觉过程。就复兴党民族主义实践而言，它反映了伊拉克民族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文明交往的最本质内容，也就是说，其内部和外部文明交往的程度决定了其社会进步的程度。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两面性决定了萨达姆政权必将内外交困的历史命运，“充分显露了盲动的、不自觉的民族主义的短视性和脆弱性。”对于复兴党民族主义发展趋势，作者认为，“从文明交往的视角来审视，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同其他文明思潮交往，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中。”

《研究》一书用文明交往理论关照民族主义个案研究，使作者能够站在世界历史交往的高度全面评析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之功过得失，其历史与现实并重，从历史中思考现实问题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萨达姆政权之后伊拉克政治走向等问题，作者的分析和判断也较为客观公允。

然而，美玉亦难免有瑕疵，笔者认为该书尚有两方面需要加强：第一，本书没有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与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进行对比研究；第二，伊拉克什叶派运动在复兴党民族主义历史中占有较重的地位，本书将伊拉克什叶派与复兴党政府的博弈分散在各章，对伊拉克什叶派的论述不够集中，略显薄弱。尽管如此，笔者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阅读这部佳作，然浅陋之心思终难揣摩作者广博之见解，书中闪光之处无法完全呈现在读者面前，本文未尽之意只能请读者亲自去品味了。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参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